

中篇

珍

一 女闾与国家妓院（谈官妓）

国家办妓院，脂粉钱最脏。

春秋初叶，齐国的管仲在宫中设女市与女闾，为中国国家妓院或官妓的开端。希腊雅典的梭伦创设国家妓院，比中国的管仲晚了五十年。

《战国策·东周》写到齐桓公宫中的“七市（鲍本“七”作“女”），女闾七百”。闾，里中之门。为门为市于宫中，使女子居住卖淫。这就是由国家经营妓院。清朝的褚学稼在《坚瓠集续集·女闾条》中写道：

管子治齐，置女闾三百，征其夜合之资，以充国用。此即花粉钱之始也。”

所谓“花粉钱”，即夜合资，国家要向女闾征取一定数量的税额，可名之为“夜合税”或“花粉税”。管子荣膺了此种税目的创始人。

女市女闾供谁玩乐呢？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写道：

昔桓公之伯（霸）也，内事属鲍叔，外事属管仲，桓公被发而御妇人，日游于市。（苏代语）

市即宫中女市，可见首先是供齐桓公日日冶游，满足他的性方面的要求。

其次是供一般游士夜宿。那些游士，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，非妇人醇酒不足以羁縻他们。有妇侍宿，乐不思蜀。

女市女闾中的官妓从何而来呢？或谓为“寡妇”，或谓为女罪犯、女俘虏被没入于宫中或官府为女奴者。《管子·小匡篇》说：“女子三嫁（嫁三次），入于春谷。”即是一种被没入为奴的女罪犯。此说有一定的道理。

汉朝时候，军妓得到了发展（见《独妇山与军妓》篇）。军妓也是一种官妓，即国家在军队中经营妓院。

六朝时发展起来的是世家拥有的家妓（见《金粉世家》篇）。家妓有家籍而无国家乐籍，因此不是官妓。但可注意晋有“御妓”，已开唐朝“宫妓”之端。宫妓是皇帝在宫中办的妓院，属于官妓性质。

黑
二
十
四
史



妓
女
史

《晋书·桓伊传》说到东晋孝武帝召桓伊饮宴，桓伊“请以箏歌，并请一吹笛人”。孝武帝“乃敕御妓奏笛”。御妓属于御府。御府的女乐表演者都是皇帝的御妓。

到了唐朝，官妓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。

唐代妓乐均有乐籍，一入乐籍，则成国家娼妓或官妓。妓乐的籍贯先隶太常，后属教坊。

隋已有教坊，唐高祖李渊设内教坊于禁中，掌教习音乐、管理倡优等事。教坊官隶属于太常卿。武则天如意元年，将内教坊易名为“云韶府”，设置云韶使，以中官为之。但仍旧隶属于太常。玄宗李隆基登基，以为太常只宜典雅乐，不宜典倡优女乐，开元二年，遂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，而云韶府不废。并于长安置左、右教坊，专掌倡优杂伎，用中官为教坊使。妓乐与妓女乐籍从此不隶太常，而属教坊。也就是说，妓乐与妓籍从太常寺独立出来了。（事见《文献通考·乐》一九）

唐朝凡有乐籍的妓女都是官妓。全国妓女的乐籍概由教坊掌管。妓女可以流动，但身分特殊。唐时有教坊籍的妓女，与尚未系籍的妓女不同。

连召侑酒饮妓，都须假诸曹行牒，何况陪宿妓女呢。

有妓女福娘者，愿嫁《北里志》的作者孙棨，对他说：“某幸未系教坊籍，君子倘有意，一二百金之费尔。”（《王团儿》）一人教坊籍，则脱籍就困难了。

自居易《琵琶行》云：“十三学得琵琶成，名属教坊第一部。”教坊妓女分部，乐籍也分部。

这不仅是国家妓女或官妓都有教坊乐籍之证，而且女子一有这种籍贯，就表示她是国家娼妓或官府娼妓，一切都要按官规办事。

唐教坊又叫教坊署，设于京城，是掌管京都与地方倡优乐籍的最高机关。至于各地官妓的管辖，则属于“乐营”。唐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下《杂嘲戏》说：

池州杜少府 慄，亳州韦中丞仕符，二君皆长年务求释道，乐营子女，厚给衣粮，任其外住。若有饮宴，方一召来，柳际花间，任为娱乐。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，兼寄大梁李尚书。诗云：“杜叟学仙轻蕙质，韦公事佛畏青蛾。乐营都是间人管，两地风情日渐多。”

写了池州与亳州的乐营。从杜慄和韦仕符听任乐营子女外住，饮宴方始召来，看来，官妓平日都住在乐营中，应召接客。如提教坊籍，一般是指长安教坊乐妓籍贯而言；如提乐籍，则包括长安与州县所有官妓的籍贯。

唐教坊乐妓有等级。唐崔令钦《教坊记》记有内人、前头人、宫人、搯弹家等。“妓女入宜春院，谓之内人，亦曰前头人”。在云韶府的“谓之宫人，盖贱隶也”。不过宜春院人少时，即可以云韶宫人添之。平人女有容色被选入内廷，教习琵琶、三弦、箜篌等乐器，谓之“搯弹家”。宜春院又有北院，那是梨园子弟所居，是最高的一等。

地方乐妓是否有等第，未见记载，但不乏名妓。如吉州官妓许永新，成都官妓薛涛。地方名妓，京师教坊可以调入。像许永新本吉州永新乐营中人，有永新乐籍。以善歌于开元末年，被选入宫中，居宜春院，最受明皇（玄宗）宠爱（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）。看来地方官妓能歌善舞一旦出名，很难保存得住。

官妓呈献歌舞，对象是皇帝与官吏。平民无福消受。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卷四记有：

明皇与贵妃每到酒酣，使妃子统官妓百余人，帝统小中贵百余人，排两阵于掖庭中，目为“风流阵”……以戏笑。

这就是“风流阵仗”四字的来源。地方官妓则往往为封疆大吏所独占，如韦皋之于薛涛（见《万里桥边女校书》篇）。

官妓可以升级，即由地方官妓升为教坊官妓，由云韶府宫人升为宜春院内人或前头人。还有一种升级，即由普通官妓升为“都知”。官妓内部凡崭露头角的都可以有做“都知”的希望。都知“分管诸妓，俾追逐匀齐”。长安名妓举举便是都知（见《北里志》郑举举）。

官妓又皆有“假母”，都“冒假母姓，呼以女弟女兄，为之行第”（《北里志》泛论三曲中事）。近世呼妓为“鸨儿”，呼娼母为“老鸨”，鸨儿亦冒老鸨姓。鸨为鸟名，喜淫无厌，因以称娼妓及娼妓的假母。

国家设官妓也就是国家办妓院。这种事业，历宋、元、明而不衰。

唐以后宋、元、明都有教坊。明教坊司隶于礼部。名妓辈出，明末尤多。如秦淮名妓董小宛、李香君，吴门名妓柳如是、陈圆圆。凡国家娼妓或官妓都有乐籍，总隶于教坊，故亦谓之“教坊籍”。

清顺治十六年裁革女乐，“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”（雍正会典）。康熙十二年复重申禁令。京师及各省由唐历宋、元、明的官妓制度从此废除。代之而起的是私人经营的娼妓事业。

顺治裁革女乐，有董鄂氏的原因。董鄂氏即秦淮名妓（官妓）董小宛（详见《董小宛与董鄂妃》篇），被洪承畴计取，送入皇宫，以博顺治之欢。顺治与董小宛情深义重，并曾一起参究“禅学”（见《清史稿·后妃传》）。顺治十六年停教坊女乐，正是董小宛死前一年，董小宛既是原籍在教坊的名妓，又与顺治参禅，则顺治废教坊女乐，就非无来由了。

国家办妓院虽以管仲设女闾为开端，但兴盛起来，则在家妓时代式微之后，即在唐朝。唐朝不禁官吏狎妓。就唐朝官吏狎妓的普遍性来看，国家办妓院有两个目的：一即收取花粉钱以充国用，二为官妓替代家妓满足官吏冶游的要求。

宋明一方面设官妓，一方面又禁官吏冶游。可是宋徽宗却狎李师师，明朝三杨（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溥）以宰相之尊，联袂召妓齐雅秀侑酒。真如王书奴所说：“禁



令甚严，但官吏冶游风气，视唐更盛”（《中国娼妓史》）。清废官妓，狎私妓的主要仍是官吏（见《嫖客与妓女》篇）。须知六朝皇帝有官妓，官吏有家妓。唐朝以后，官吏家妓丧失，安得不作冶游？唐朝不禁，宋明有禁而不能禁，可视为官吏与皇帝的争风。皇帝官妓不废，安能禁止官吏狎妓？



二 妓女与唐进士新阶层

珍

金榜题名日，曲江挟妓游。

进士在唐是一个新阶层。这个新阶层出现于武则天时代。

进士科在隋炀帝的时候便产生了，但直到唐太宗，进士出身的人不多，做官的更少。武则天要做皇帝，把反对她的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，几乎一网打尽。自北周以来隋唐在政治上牢不可破的关陇集团，被彻底摧毁。到她做皇帝的时候，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变，被她杀掉的人就更多了。她急需有一个新的官吏集团拥护她，于是用极大的力量去发展进士词科，选拔新的官吏，由进士出身做官的人激增。谁考上进士，谁就可以平步青云。当应考人看到进士榜上有自己的名字时，简直要发疯。正是：

“春风得意马蹄急，一朝看尽长安花。”

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《选举二》载有《唐登科记总目》，所记高祖、太宗、高宗、则皇后四朝登科人数甚详，从中可以看到武则天时期进士作为一个新阶层的勃兴。

唐高祖武德一共九年，共计上书拜官一人，秀才六人，进士二十六人。新旧《唐书》不载这二十六个进士的姓名。即未被起用做官或虽被起用，做的是不足道的小官，故名不入新旧《唐书》列传。

唐太宗贞观一共二十三年，共计秀才二十二，进士二百零五人，上书拜官一人。录取的进士多起来了。可是在新旧《唐书》中，只有两人是贞观进士。一为敬播，列于《儒学传》；一为郭正一，列于《文苑传》。名均不显。显然，贞观时期，进士尚未形成一个新阶层。

到高宗、武则天时期不同了。高宗一共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，但自显庆元年起，即自他当皇帝的第七年起，因为“多苦风疾，百司表奏，皆委天后（武则天）详决。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，威势与帝无异”（旧《唐书》卷六《则天皇后纪》）。自显庆元年（656 丙辰）到武则天死的那年（705 乙巳），五十年间，都可视为武则天统治时期。在这半个世纪中，录取的进士为一千一百五十七人，明经等诸科及上书拜官的一百六十一人，续试、重试与续试未言及第者四十三人。进士人数为高祖时进士的四十四倍半，贞观时进士的五点六倍。

当然，单看人数，尚不足以言进士新阶层即在武则天时代形成，重要的是看任

用。

翻检新、旧《唐书》，自显庆以后，在武则天时期，以进士出身而成为名臣、名家的人很多。下据《旧唐书》，举宰相为例。为清楚起见，先列年号。显庆以后，依序为：

显庆、龙朔、麟德、乾封、总章、咸亨、上元、仪凤、调露、永隆、开耀、永淳、弘道、嗣圣、文明、光宅、垂拱、永昌、载初、天授、如意、长寿、延载、证圣、天册万岁、万岁登封、万岁通天、神功、圣历、久视、大足、长安、神龙。武则天死于神龙元年。

韦承庆。本传（卷八八）说“他弱冠举进士”。“自天授以来，三掌天官选事”。则天时，官至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。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为宰相之职。

苏頲。本传（卷八八）说他“弱冠举进士”，累迁左台监察御史。长安中，奉诏复按旧狱，雪冤者甚众。至玄宗开元四年，“迁紫微（中书）侍郎，同紫微黄门（门下）平章事，与侍中宋璟同知政事”，为宰相。

苏味道。本传（卷九四）说他被本州举为进士。圣历初，迁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即为宰相。苏味道与李峤齐名，时人谓之“苏李”。此人处事“但摸棱以持两端”，故有：“苏摸棱”之称。成语“模棱两可”从他而出。

李峤。本传（卷九四）说他“弱冠举进士”。“则天深加接待，朝廷每有大手笔，皆特令峤为之”。圣历初，与姚崇偕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为宰相。

宋璟。本传（卷九六）记他于开耀二年举进士，累转凤阁舍人。至玄宗开元时，做了侍中，又迁尚书右丞相。宋璟与姚崇为玄宗开元名相，并称“姚宋”。

郭元振。本传（卷九七）说他也是进士出身，却做了名将。大足元年，迁凉州都督、陇右诸军州大使。在凉州五年。中宗朝，迁左骁卫将军，兼检校安西大都护。睿宗朝，为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代宋璟为吏部尚书，转兵部尚书。

源乾曜。本传（卷九八）说他举进士。玄宗开元时拜左丞相，任政事十年。

张九龄。本传（卷九九）说他是岭南曲江人，登进士第。按《高宗纪》显庆四年春二月乙亥记“上新策试举人，凡九百人。惟郭待封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”。而《唐登科记》记显庆四年，惟取进士二十人，则张九龄当于此年进士及第。张说常谓张九龄“后来词人称首”。玄宗时为中书令，又迁尚书右丞相。

高智周。《良吏传》说他举进士，三迁兰台大夫。咸亨二年，任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转御史大夫。

吉頊。《酷吏传》记他举进士，累转明堂尉、擢右肃政台中丞。“日见恩遇”。圣历二年，迁天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

以上举了十个以进士出身而为宰相的人物。为相时间有早晚，但都在武则天时举进士。

除此以外，虽未做到宰相，以进士出身而特蒙眷宠的名臣、名家的，也颇为不



珍

少。例如《史通》的作者刘知几（刘子玄），在武则天时，“掌知国史，首尾二十余年”。预修《三教珠英》、《文馆词林》、《氏族系录》、《唐书实录》。《史通》于玄宗时完成。杜甫的祖父、著名文学家杜审言。与宋之问齐名，时人谓之“沈宋”的沈佺期。长安中为通事舍人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，被称为唐古文运动的肇始者，麟台正字陈子昂。李白的知友、曾任太常博士、秘书监的“四明狂君”贺知章。与富嘉谟友善的新安人吴少微，富、吴二人同列《文苑传》。颜杲卿之父亳州刺史颜元孙。陇右、陕西两道按察史、玄宗开元时，九迁国子祭酒的元行冲。与源乾曜等做过十道陟便，玄宗开元时，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的马怀素。与宋之问并称户部“二妙”，中宗时为吏部尚书的韦虚心。历任左台御史、大理正、左御史中丞、大理少卿、按察使的王志愔。武则天时为监察御史，玄宗时为吏部尚书的崔日用。玄宗时，曾“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机密”的卢怀慎。等等。

根据以上例证，谁也无法否定武则天时，进士已作为一个崭新的阶层，在政治舞台上出现。

由于武则天重视进士词科，重用进士出身的人为大臣，因此，士子无不将考上进士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。而一旦考上，则欣喜若狂。召妓侑酒，便成了他们为自己庆贺的最佳形式。妓女则因为他们是新进士，红人，也无不热烈接待。唐进士遂与妓女结成了不解缘。何况唐朝对于新进士又有自己的规矩。

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下说：进士既捷，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，谓之“题名会”。大宴于曲江亭子，谓之“曲江会”。关于曲江会，《唐摭言》卷三《散序》说：

逼曲江大会，则先牒歌坊，请奏上御紫云楼，垂帘观焉。时或拟作乐，则为之移日……敕下后，人（进士）置被袋，例以围障、酒器、钱绢实其中。逢花即饮。故张籍诗云：“无人不借花间宿，到处皆携酒器行。”其被袋状元（进士第一人）录事（妓女）同。检点会缺一则罚金。曲江之宴，行市罗列，长安几于半空。公卿率以其时选东床，车马阗塞，莫可殚述。

初举进士，挟妓游宴，时或作乐，为之移日，恍如奉旨一样。被袋中的围障、酒器、钱帛等物，由状元公与妓女一同检查，缺了一样，便要罚令。有的进士故意藏起一件，甘愿受罚，以为笑乐。公卿以其月选进士为东床快婿。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。这就更增加了曲江会的热闹性。

无妓不成曲江会。这是规矩。新进士狎妓，当然不会只在这一天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卷二说：

长安有平康坊，妓女所居之地，京都侠少萃集于此。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，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。



这是新进士往访平康。另一种是召妓至他处宴集。由于妓女籍隶教坊，召集外出，“须假诸曹署行牒”。但新进士召妓则有优待，赠资加倍。

进士狎妓，佳话颇多，《北里志》有记载。例如：

刘覃登第，年十六七，自广陵入举，辎重数十车。名马数十匹。时同年郑贲先辈扇之，极嗜欲于长安中。（见天水仙哥条）

孙龙光为状元，颇惑之。（见郑举举条）

莱儿，进士天水光远一见溺之，终不能舍。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，尤谄附之。（见杨妙儿条）

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，能吟诗，与进士郭昭述相爱。郭昭述授天长县主簿，与刘国容相别。行至咸阳，刘国容差一女仆乘矮驹送短书于郭昭述。书云：

欢寝方浓，恨鸡声之断爱；恩怜未洽，叹马足以无情。使我劳心，因君减食，再期后会，以结齐眉。（卷三《鸡声断爱》）

这封短书，长安弟子多能讽诵。

有个妓女叫颜令宾，“举止风流，好尚甚雅，事笔砚，有词句”。曾出自题诗付小童，令小童“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”，并请他们来家，说“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”（《北里志》）。这是妓女主动邀请及第新进士来曲里家中作客。新进士见了颜令宾自题的诗，怎能不被她的才华吸引呢？

唐朝进士狎妓，只有从武则天以后进士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兴起，才可理解。这就是时代性。宋时此风已转，狎妓的不是进士，而是太学生了。宋朝以守内虚外为国策，对辽、金、元实行妥协投降政策。太学生言词激烈，如郑肃上诗论花石纲扰民，陈东上书论大臣误国，请斩蔡京。但又有何用？遂至纵情于声色，而酒酣未尝不大骂奸臣误国殃民也。明朝文士与名妓往来，如冒辟疆之于董小宛，侯方域之于李香君，则又与此一时代阉奸擅权，国事日非，满清兴起有关。花丛不仅多才女，而且多激昂慷慨之姝，遂形成名士与名妓的结合。



三 妓女与诗、词、曲

珍

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素负盛誉。作家被看作文学巨匠。可是唐诗、宋词与元曲的传播，却靠了妓女。没有她们的歌喉，朝鲜人何知有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？有井水处何知有柳永词？元代杂剧如果没有表演者，那就只好束之高阁。由唐诗一变而为宋词，宋词又一变而为元曲，最大的功臣，应该说不是文人，而是妓女。

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
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。唐诗是能唱的，而唱者为歌妓。唱诗在唐是一种风俗习惯，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说得很详细。王云：

唐时古意亦未全丧，《竹枝》、《浪淘沙》、《抛球乐》、《杨柳枝》乃诗中绝句，而定为歌曲。故李太白《清平调》词三章，皆绝句。元、白诸诗，亦知音者协律作歌。白乐天守杭，元微之赠云：“休遣玲珑唱我诗，我诗多是别君词。”乐天亦醉戏诸妓云：“席上争飞使君酒，歌中多唱舍人诗。”……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诣旗亭饮酒……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伶唱适绝句……须臾，妓唱之涣诗（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……”）。以此知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，盖常事也。

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长安妓唱之，汉南妓唱之。伶妓取唐诗人诗歌入于歌曲，使唐诗得以远播，不是成了传播唐诗的大功臣吗？

至于唐朝妓女所作的诗歌，被收入《全唐诗》的也有不少。其中以蜀妓薛涛为最有名。她在高骈席上作了“闻说边城苦”一首五言绝句，第三、四句说：“好将筵上曲，唱与陇头儿。”这是自制自唱（薛涛另见《万里桥边女校书》篇）。

越妓刘采春写了六首《罗唝曲》。一首云：

不喜秦淮水，生憎江上船。载儿夫婿去，经岁又经年。

不喜、生憎、经岁、经年虽然重复，却活画出儿女子口吻。《罗唝曲》是可唱的，制者、唱者都是刘采春。

再如无姓名的武昌妓所写《续韦蟾句》：

悲莫悲兮生别离，登山临水送将归。武昌无限新栽柳，不见杨花扑面飞。



沈德潜云：“上二句集得好，下二句续得好。”（《唐诗别裁集》）

中唐以后，新文体“词”产生，妓女有绝大的功劳。

六朝清商乐余波，至唐而绝。妓乐多用五七言诗代替。但如果全依五字一句、七字一句来唱，总有不好唱处，因此应用“和声”。并和声作实字，便成了长短句。《全唐诗·附录》说：

唐人乐府，原用律、绝等诗，杂和声歌之。其并和声作实字，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，为填词。

词即由此产生。而“并和声作实字，长短其句以就曲拍”的，却是歌妓。唐歌妓实为由诗到词的架桥者与先行者。她们创作的乐谱也就是词谱。

由歌妓而诗人。白居易作《忆江南》，刘禹锡又“和乐天《春词》，依《忆江南》曲拍为句”（和词题注），表明诗人步歌妓之后，走上了按谱填词的道路。到了晚唐，温庭筠诸人为迎合妓女心理，力“逐弦歌之音，为侧艳之词”（《旧唐书·温庭筠传》），纷纷按谱填词。词遂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。但这仍旧存在着妓女的促成之功。今存《花间集》，收有温庭筠诸家之词。花间者，妓丛也。下录温庭筠《菩萨蛮》一首。

南国满地堆轻絮，愁闻一霎清明雨。雨后却斜阳，杏花零落香。无言弹睡脸，枕上屏山掩。时节欲黄昏，无聊独依门。

唐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，温庭筠《菩萨蛮》词较多，宣宗每使宫嫔歌之。宫嫔人人爱唱，温庭筠名声大噪。宫嫔者，宫妓也。

宋朝大词人常为妓女座上客。他们为妓女填词作曲，妓女为他们的作品吹弹歌唱，形成一种难分难解的关系。无女妓，宋朝怎能成为词的黄金时代？

北宋大词人柳永（柳三变）自云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（《鹤冲天》）。他为妓女填词，妓女也求他填词。宋翔凤《乐府余论》说：

耆卿失意无俚，流连坊曲，遂尽收俚俗语言，编入词中，以便伎人传习，一时动听散播四方。

为妓女填词而尽收俚语，遂使其词借管弦与歌喉越传越广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又说：

柳永字耆卿，为举子时，多游狭斜，善为歌辞。教坊乐工每得新腔，必求

永为辞，始行于世。

柳永词无妓人不能播散。妓人新腔无柳永不能行世。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，显而易见。

其时，“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”。《吹剑续录》说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好十七八女孩儿，按执红牙拍，歌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（《雨霖铃》）。”柳词唱遍天下。“十七八女孩儿”，妓也。

再说周邦彦，精于音律，亦喜流连坊曲，与镇安坊名妓李师师情同师徒。他写了两首词：《少年游》与《兰陵王》。李师师唱给宋徽宗听，前一首得罪了宋徽宗，几至丧身；后一首为徽宗寿，徽宗不仅赦了他，且用他领大晟乐府（详本书《李师师与宋徽宗、周邦彦、宋江》篇）。

陈郁《藏一话腴》谓周邦彦“以乐府独步，贵人、学士、市侩、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”。周邦彦词与妓女的关系，实不下于柳词。

宋代妓女能词者十之七八，能唱也能作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四十《丽人杂记》记广汉营妓僧儿为汉守送行，作《满庭芳》见意云：

团菊苞金，丛兰减翠，画成秋暮风烟……两度朱幡雁水，全胜得陶侃当年……

《词苑丛谈》记有施酒监者，与杭妓乐宛结好。施尝赠以《卜算子》词，乐宛答云：

相思似海深，旧事如天远……若是前生未有缘，重结来生愿。（卷七纪事三）

你说，宋朝妓女，可不可以称为女词人？

王书奴说：“我看古今最不守旧，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者，莫如娼妓。时代尚诗，则能诵诗作诗，时代尚词，则能歌词作词，时代尚曲，则能歌曲作曲”（《中国娼妓史》）。这话说得很好。元朝进入了曲的时代，妓女与曲又结成了不解缘。

元朝的妓女都会唱曲，有的且会作曲。《青楼集》记元代坊曲中善唱杂剧的有顺时秀、南春宴、司燕奴、天然秀、国玉第、天锡秀、王奔儿、平阳奴、赵偏惜、金兽头、王玉梅、李芝秀、朱锦绣、小玉梅、赵真真、李娇儿、张奔儿、翠荷秀、汪怜怜、米里哈、顾山山、李芝仪女童童、帘前秀、燕山秀、荆坚坚、李定奴。可谓多矣。顺时秀“杂剧为闺怨最高，驾头诸旦本亦得体”。天然秀“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，花旦驾头亦臻其妙”。赵偏惜“旦末双全”。李芝秀赋性识慧“记杂剧三百余段”。朱锦绣“杂剧旦末双全，而歌声坠梁尘”。李娇儿“花旦杂剧特妙”。时



人目张奔儿为“温柔旦”，李娇儿为“风流旦”。燕山秀“旦未双全，杂剧无比”。

善唱诸宫调的有赵真真、杨玉娥、秦玉莲、秦小莲。秦氏二莲“善唱诸宫调，艺绝一时，后无继之者”。

善唱慢词的有解语花、小娥秀、王玉梅、李芝仪、孔千金。

善小唱的有真凤歌、李芝仪、李心心、杨柰儿、袁当儿、于盼盼、于心心、吴女、燕雪梅、小娥秀。

善合唱的有于四姐，“合唱为一时之冠”；金莺儿，“掐箏合唱，鲜有其比。”

专工南戏的有龙楼景、丹墀秀。“龙则梁尘暗簸，丹则骊珠宛转。”

元代戏曲可谓包罗万有。诸宫调为金代产物。慢词产于北宋。小唱李师师是名家。南戏“出于宣和之后，南渡之际，谓之温州杂剧”（祝允明《猥谈》）。在元朝均与杂剧并行于世。杂剧合动作、言语、歌唱三者而成，为元代戏曲中心。而当时娼妓几无一人不通杂剧，元代杂剧之盛，与娼妓的诵习传播关系之密切，又可想见。

明代自嘉靖以后，金陵坊曲中的娼妓，大都能诗。

冒伯麟集郑如英（字无美，小名妥）、马湘兰、赵彩姬（字令燕）、朱无瑕（字泰玉）之作为《秦淮四美人选稿》。郑如英居金陵旧院，韶丽惊人，手不去书，有《述怀诗》。马湘兰南曲中与赵彩姬齐名。马湘兰有诗二卷，王伯□为之序。赵彩姬名冠北里，冒伯麟刻其诗附于马湘兰之后。朱无瑕为桃叶渡边女子，淹通文史，工诗善书。“万历己酉年，秦淮有社，会集天下名士，泰玉（朱无瑕字）诗出，人皆自废。”（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闰集香奁下）她有《绣佛斋集》，当时人比之马湘兰。

他如赵燕如、崔嫣然、郝文珠、桃叶女郎沙宛在、金陵娼家女杨玉香等莫不能诗。对元曲来说，这又是一变。明朝自前七子李梦阳、何景明等人以来，倡导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。后七子李攀龙、王元美出，其势益张。坊曲娼妓遂又趋于吟诗或作诗一途。

明末妓女能诗，详见《晚明才女出花丛》篇。

诗、词、曲之所以能成为唐、宋、元文学的代表，妓女的功劳实不可没。

四 嫖客与妓女

官吏为嫖客，历代最多闻。

嫖客中何种人最多？曰官吏。何种人历朝不衰，为妓院常客？曰官吏。何种人最荒唐最无耻？曰官吏。

六朝家妓时代以前不谈，因为妓在家门。从唐朝谈起。

王书奴云：“唐代官吏狎娼，上自宰相节度使，下至庶僚牧守，几无人不从事于此，并且任意而行，奇怪现象百出。”（《中国娼妓史》）

长安教坊女妓是天子的禁脔，官吏不敢染指，但唐朝乐营遍于全国，官吏到一地，乐营中的妓女便成了他们猎物。举例言之。

故吏部沈公某与张好好。杜牧《张好好》诗序：“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，好好年十三，始以善歌来乐籍中。后一岁，公移镇宣城，复置于宣城乐籍。”为取乐竟转移妓女乐籍。

李尚书与韶光、湄川。宋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卷二三《寓情门》记媚川，歙州酒录事。尚书李擢守歙，颇留意，而已纳营妓韶光。罢州日，与吴员交待托令存恤。临发共饮，不胜离情。有诗曰：“经年理郡少欢娱，为习干戈间饮徒，今日临行更交割，分明留取媚川珠。”将妓女媚川交割给后任吴员，亦少有。吴员答诗有“韶光今已输先手，领得蠙珠掌内看”之句。他总算得到了媚川。

御史裴质与灼灼。宋张君房《丽情集》寄泪条：“灼灼，锦城官中奴（官妓）。御史裴质与之善。裴召还，灼灼每遣人以软红绢聚红泪为寄。”

薛宜僚与段东美。会昌中，薛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，从青州泛海，遭恶风雨泊邮传一年，属情于乐籍中的段东美。当地节使即以段东美置于驿中，以侍薛宜僚。后薛宜僚至外国染疾死，榱回青州，段东美扶棺一恸而卒（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卷七）故事哀艳动人，可薛宜僚以册赠使而中途狎妓，未免荒唐。

韦皋与薛涛。何光远《鉴诫录》记韦皋镇成都日，薛涛每承宠爱。唐衔命使臣每至成都，便求见薛涛。薛涛狂逸，亦与之周旋。触怒了韦皋，韦皋于是不许薛涛从官。薛涛作《十离诗》，才复蒙宠召（另见《万里桥边女校书》篇）。

白居易、元稹与玲珑。《尧山堂外纪》记玲珑为余杭歌者，白居易“作郡日，赋诗与之”。时元稹在越州，“重金邀去，月余始还，赠之诗”。并且寄了一首诗给白居易。诗云：“休遣玲珑唱我词。我词都是寄君诗。明朝又向江头别，月落潮生是甚时。”二人同狎一妓。

宋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记白居易“为郡时，尝携容满、张态等十妓，夜游西湖



武丘寺，尝赋纪游诗”。清赵瓯北《题白香山集后》诗云：“风流太守爱魂消，到处春翘有旧游，想见当时疏禁网，尚无官吏宿娼条。”后一句是唐代官吏肆无忌惮好冶游的原因之一。

然而，宋朝对于官吏狎娼，禁令甚严，而官吏狎娼风气，比之唐朝，尤有过之。连宋徽宗也狎娼呢。

宋朝权臣狎娼荒唐透顶。像：

王黼，于后园聚花石为山，中列四巷，俱与民间娼家相似，与李邦彦辈游宴其中，朋邪昵呢”（《靖康遗录》）。请假归咸平焚黄，“画舫数十，沿路作乐”（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）。真可谓色中之魔。

秦熺，“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，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……平江（苏州）当运河，结彩楼数丈，大合乐，官妓舞于其上，缥缈若在云间。熺处之自若”（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）。又是一个色魔。

贾似道，“日游诸娼家，至夜即宴游湖上”。既做宰相，“进娼优奉帝（度宗）为游宴”。又是一个色魔。

这就无怪乎文人如欧阳修、苏轼等人的浪漫冶游了。恐怕文人而兼大臣的人中，只有一个王安石干净。

金朝官吏狎娼不给钱，由荒唐进入无耻。金刘祁《归潜志》卷六云：

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，牙虎带，馆之酒肉，使妓歌于前。及夜因使其妓侍寝。迟明将发，令妓征钱，合住愕然。牙虎带强发其篋，取缙帛悉以付妓。曰：“岂有官使人而不与钱者乎？”合住无以对而去。

像合住这样的白嫖官吏，在金朝恐怕比比皆是。牙虎忽带看不惯，作了护花使者。他还曾“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取贿赂”。

《金瓶梅》记西门庆酷嗜鞋杯，按明顾元庆《云林遗事》云：

杨廉夫耽好声色，一日，与元镇（号云林）会饮友人家，廉夫脱妓鞋置酒杯其中，使座客传饮，名曰“鞋杯”。元镇素有洁癖，见之大怒，翻案而起，连呼齷齪而去。（《说郭》续二十一洁癖。元镇为倪瓒字。）

则“鞋杯”起于元朝官吏的狎娼行径中。当时尚未盛行，故倪瓒看不惯，大呼齷齪而去。鞋杯的出现，表明官吏狎娼愈演愈无聊，愈无耻。

明朝对官吏狎娼亦有禁令，但与宋一样，有令如同无令，宰相可以狎娼，守土官吏也可以狎娼。

《尧山堂外纪》记三杨：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溥当国时，有一妓名齐雅秀，性极巧慧。”一日，令侑酒，众人说：“汝能使三阁老笑乎？”齐雅秀笃定地答道：“我一

人便令笑也。”等到见了三位阁老，阁老问道：“来何迟？”齐雅秀道：“看书。”阁老问：“何书？”齐雅秀道：“烈女传。”三阁老大笑，骂道：“母狗无礼。”齐雅秀立即回嘴：“我是母狗，各位是公猴。”一时京中大传其妙。

三杨联袂狎妓，为妓所窘，竟无可奈何。朝廷不管其事。

清朝将明朝等同具文的“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，杖八十”，拿来应用。由于一面废官妓，一面禁官吏宿娼，情况比之明朝确要好一些。可是，一到私娼兴起，禁令废弛，亲贵官僚狎娼之风日趋大盛。

同治嫖院（另见）是一个特殊事件，可以不论。至若洪钧之恋赛金花，持节出使英国，携之而去，载振之恋谢珊珊，某二爷之恋苏宝宝，竟曾轰动北京。北地胭脂，如双凤（大金凤、小金凤）二姐、万人迷，王公大人拜倒于裙下的，也是争先恐后。海某内务府郎中以昵万人迷倾其家（《清代声色志》）。后来的督军，每一督军最少有姬妾十人以上。这还不够，私娼、女优、打鼓的、良家女子，几无一不嫖。真可为荒唐绝伦。

官吏嫖妓，既是阶级矛盾，又是官民矛盾，而以后者为表现形式。

至于商人嫖妓，在官妓时代，只能拾官吏的遗唾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所云“名属教坊第一部”，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是也。商人涉足妓丛，惟近代私妓兴起，始趋于兴盛。

如果说古代官妓营业以歌舞为主，则近代私妓营业以卖淫为主。“鸨儿爱钞”，看嫖客但从钱财着眼，商人乃得乘时而入。但对妓女来说，“钱”是一个字，“情”又是一个字。情投意合而又多金，常以喜剧收场。钱与情如果发生矛盾，对重情的妓女来说，宁重情而舍钱，这就必然要与鸨母发生矛盾，以悲剧收场。当然，也有与鸨母一致重钱的妓女。嫖客囊尽，才知为妓女的虚情假意所骗。但无论哪一个妓女都不想一辈子过妓女生活，总想择人而从之，不可能长久与鸨母保持一致。

《聊斋志异》写了一个故事，杭州名妓瑞云将迎客，对假母蔡媪说：“价由母定，客则听女自择之。”她想两全。母乃定价十五金，自此富商贵介日接于门，而瑞云独钟情于余杭贺生。贺生家仅中贫，不能娶她。母见她择婿数月，不得一人，将强夺之而未发。幸得“仙人”之助，先弄黑了瑞云，贺生才能买之而归。仙人恢复了瑞云的洁白。这个故事是说要两全，既满足假母的贪欲，又遂顺妓女择婿的心意，是很难办到的。除非有情又有钱。

俞曲园《右台仙馆笔记》记汉皋妓李玉桂钟情李孝廉，这位孝廉春风失意，旅食京华，不能娶她。“有富商某，艳其色，强委千金于其假母，劫之去”。李玉桂仰药死。鸨儿重金，姐儿重情，结果铸成悲剧。

也有两全的。淞北玉毓生（王韬《海陬冶游录》）记有妓朱湘卿，“雪肤花貌，旖旎温柔，工词曲，知书识字，丰度娴雅”。有贾客某人“愿致湘卿于金屋，姬（朱湘卿）亦心焉许之”。不料“某词林来沪，续与姬有割臂盟”，变成三角恋爱。贾客设一计，谎言游云梦，与朱湘云同乘马车而出，将她藏在别墅中，不叫她回妓



院，写好婚帖，办理结婚手续，朱湘云遂归于他。这个商人算是有钱又有情的人，而朱湘云对他亦非无情。鸨母因他有钱，亦无话说。此故事以喜剧收场。也许是传统的贱商贾的思想作怪，人们竟可惜“绝代名花，一旦忽为沙吒利折去”。

这个富商与某词林争一妓，因使诡计而胜利。但无论商人怎样富，却斗不过巨阔。王韬《淞滨琐话》记沪上名妓吴佩香“艳帜独张，而巨阔富商争掷缠头锦者无数，惟恐不得其当。卒为有力者篡去”。有力者，巨阔也。商斗不过官。

妓院经营方式，在官妓时代，有所谓召妓侑酒，在近代有所谓出局或叫出条子。

出局即为妓女应嫖客之邀，出外或侍宴佐酒，叫“酒局”，这与古代召妓侑酒相同。或陪赌，叫“牌局”。或陪看戏，叫“戏局”。嫖客如在妓馆、书寓、酒馆或戏园招妓前来，则称“叫局”或“叫条子”。叫局一般要先填写“局票”，然后派人送给妓女本人。妓女出局，老板往往派大脚娘姨或小大姐跟随，谓之“跟局”。一客叫二妓谓之“双局”，一妓连续收到局票，从甲处直接到乙处，谓之“转局”。夜晚出局叫“夜局”。陪客到天明叫“天明局”。

这是就官、商等高级嫖客与“清吟小班”、“长三书寓”等高级妓女而言。低级妓女在门口、路上站关拉客，何叫局、出局之有乎？

妓女所得“局钱”，如果妓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“讨人身体”，须全交老板（掌班或班主），除去花捐、杂税外，由老板与龟鸨（领家）订约分成。这类妓女要受官家、掌班及其直接主人领家的三重剥削。如果妓女是有相对自由的“自家身体”，可直接与掌班老板订约分成，但花捐、杂税自付。情况并不比讨人好多少。

嫖，从嫖客来说，除了明末东林党人、复社人物另有所寄之外，无论官商，全从感官刺激出发。在妓女面前，他们非人而为禽兽。唐宋元、白、欧、苏诸公，风流则风流矣，可同样作了感官的俘虏，理性思维都落于不好此道的王安石之后。从妓女来说，她们处于被侮辱、被蹂躏的地位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她们是人不是兽。古代妓女柳如是能毁家纾难（见《女中丈夫柳如是》篇），近代妓女如汉皋李玉桂，视千金如粪土，仰药殉情。谁能说她们不是人类中的皎皎者？

五 宋朝的官营酒吧间

珍

谁知王安石，变法创酒吧？

宋汪拯《燕冀谋贻录》记王安石变法，实行官卖酒制度，“命娼女坐肆作乐，以蛊惑之。小民无知，竞争斗殴，则又差兵官列架仗以弹压之，曰‘设法卖酒’”。这是一种由官府出面经营酒吧间的制度。所以名之为“酒吧”者，此种官营酒店有娼女坐肆作乐，以广招徕故也。王安石的思想倒很开放，但律己甚严，某次自金陵过苏州，知苏州刘原甫设宴招待，列营妓于庭下，王安石“作色不肯就坐”（《侯鯖录》），刘原甫只好撤去营妓。不像欧、苏诸公挟妓漫游。

南宋官卖酒用妓作乐，无复弹压之制，而“设法”之名不改（亦见《燕冀谋贻录》）。酒吧的兴旺发达，把北宋的但命娼妓坐肆作乐，远远抛到后头去了。

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记官家诸酒库寒食节与中秋节前后，开酤煮酒与开酤新酒，也就是一年搞两次开张，仪式盛大。诸酒库：

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，一等特髻大衣者，二等冠子裙背者，三等冠子衫子裆胯者，前有小女童等，及诸社会，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，呈作乐，呈技艺杂剧。三盏退出，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。

《梦粱录》卷二记有“酒样”牌子，“以三丈余高白布写‘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，酤造一色上等浓辣无比高酒，呈中第一’，谓之‘布牌’。以大长竹挂起，三五人扶之而行”。此种做广告的方式，可谓空前绝后。嗜酒好色者，无不坠人彀中，“最是风流少年”，看到美人骑在马上，“沿途劝酒，或送点心。间有年尊人，不识羞耻，亦复为之，旁观晒笑”。凡逢这样一天，诸酒肆皆“结彩欢门，游人随处品赏，追欢买笑，倍于常时”。

《都城纪胜》又说官酒库有东酒库、西酒库、南酒库、北酒库、南上酒库、西子库、中酒库、南外库、东北库、北外库。其他则有西溪并赤山九里松酒库等，官酒库可谓多矣。每一座官酒库都开设了酒楼，“若欲赏妓，往官库中点花牌”。花牌上写有妓名，“诸库皆有官名角妓，就库设法卖酒”（《梦粱录》卷十）。欲买一笑，径往库内点花牌可也。想点谁便点谁，惟意所择，惟金是衡。

官酒库买笑妓女除官妓外，尚有私妓。《梦粱录》卷二十写“妓乐”，有她们的姓名。其言云：